

贵州古籍集粹

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

杨元朴 注 释
贵州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郑珍画像 刘新文
技术设计 黄国昌

贵州古籍集粹
郑珍集经集诗集校注
杨元桢 注释
贵大古典文学教研室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375印张 54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

ISBN 7-221-02473-1/I·284 定价: 18.00元

本书受

贵州省一九九〇年度

出版基金资助

内 容 提 要

郑珍，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晚号且同亭长，贵州遵义人。清道光年间拔贡，晚清经学大师和海内外著名诗人。郑珍的《巢经巢诗》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备受推崇，被誉为清道光年间一代诗宗。陈衍、翁同书、王心柏、梁启超直至今人缪钺、钱钟书等对郑诗都有较高的评价。钱仲联先生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就有这样的赞语：“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

本书收集了郑诗893首，另附词9首，是现今收集郑诗最全的版本。全书注释详尽，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研究郑诗最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书。

出版说明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作为省一级建置始于明代初年。但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与中原地区交往频繁。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贵州曾涌现出许多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学术上的优秀历史人物。事实说明，贵州各族人民对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记录贵州各族人民历史活动的文献古籍，也很丰富。据《贵州通志·艺文志》著录，仅明清两代，贵州的各种著作就近两千种。

长期以来贵州的古籍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许多有价值的善本、抄本甚至孤本古籍，或深藏于图书馆，鲜为人知；或流散在社会上，已湮湮没。以致贵州的历史文化，不仅省外人士知者寥寥，就是长期生活在贵州的人也不甚了解。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把我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的精神，我们在有关各方面的协助下，初步对省内古籍进行了综合归类。在此基础上，精选其中若干种，内容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地理等，约请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整理，以点校、校注、评注等形式，编辑了这套《贵州古籍集粹》。我们相信，这部丛书的问世，将对国内外人士了解贵州，学术界研究贵州，增强贵州

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振兴贵州的经济、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丛书第一批约50种，将在五至十年内陆续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前 言

《巢经巢诗集》系清道光、咸丰年间，“西南巨儒”、晚清著名诗人郑珍所著。郑氏《巢经巢文集》卷三记云：“玉川子（唐代诗人卢仝号玉川）欲拾遗经，巢之空虚，诚之贵也。以余得之之难，其视玉川子之贵又何如？僦夷夷牢水上，若羁禽无定栖，因以巢名所寄之室。”后亦以“巢经巢”名其诗集。

郑珍，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晚号且同亭长，自称子午山孩、巢经巢主。清嘉庆十一年（1806）生于贵州遵义县西乡天旺里玉磐山下河梁庄。郑珍祖籍江西吉水，七世祖郑益显为游击将军，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随刘挺军入播州平乱，后被留带兵屯防遵义西乡水烟一带，遂落籍遵义。祖父仲侨，乾隆诸生，对郑珍特别钟爱，五六岁时便教他读书识字。郑父文清对郑珍课督很严，九岁时便教完《毛诗》，除授以群经外，还兼及先秦诸子与《山海经》等。郑母黎氏是遵义沙滩黎安理（号静圃，乾隆举人，官山东长山知县）之女。由于出身书香门第，对儿子的学业尤为关切，每当夏秋之夜，一边纺纱，一边督促儿子苦读。郑珍在《题黔西孝廉史蘧洲秋灯画获图》诗中描绘道：“平生我亦顽钝儿，家贫读书仰慈母。看此寒灯照秋卷，却忆当年庭

下时。虫声满地月在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两句书，累母四更五更守。”郑珍12岁时，送到遵义川湘书院读书。书院讲席是江西知名学者李腾华（字邳芸），指导郑珍读了不少书。14岁时，举家迁往遵义沙滩外祖父黎安理家附近之尧湾，僦屋居住。是年冬，外祖父病逝，大舅父黎恂（字雪楼，清嘉庆进士，任浙江桐乡县知县），由浙江弃官奔丧返家，带回大量古籍书，郑珍便从其学。黎雪楼见他颖悟异常，“知非小就才，令多读古籍”。于是尽发舅家“藏书数千卷，纵观古今，殚心四部，日过目数万言”（郑知同《子尹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郑珍在《埋书》诗中也写道：“十四学舅家，插架喜侈看。始知览八千，旧是先生贯。”他过去读的书都是应试的八股文，而今读了众多典籍，视野大开，而学大明，“自忖非潜心宋五子之学，无以求圣人之道，终不能跻古儒者”（知同《行述》）。于是重点研读程、朱之学，为后来研治经学打下了基础。在黎雪楼先生的指导下，郑珍的诗才大进。在《阿卯晡日作》诗中自云：“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蟠。读书扫俗学，下笔如奔川。谓当立通籍，一快所欲言。”黎雪楼对他宏伟的抱负，超群的诗才，十分赞赏。每当他的诗篇写成，雪楼先生常击节称奇，赞道：“昔欧阳文忠公刮目苏子瞻，有当让此人出一头地之许，吾于甥亦谓然。”（知同《行述》）于是，黎雪楼遂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郑珍。

道光二年（1822），郑珍17岁中秀才，补县学子弟员，旋食廪饩。次年，独山莫与俦（字犹人，翰林院庶吉士）任遵义府学教授，他是汉学大师阮元门生，提倡汉、宋学，举清儒阎若璩“六经宗服郑，百行法程朱”的榜联为准绳，从学者甚多。郑珍也入府学，从莫氏受业。莫任教19年，培育了众多人才。其中郑

珍、莫友芝最为出类拔萃，后来二人结为莫逆之交。

道光五年（1823），郑珍20岁被选为拔贡。主持考选的贵州学政程恩泽（号春海，官至礼部侍郎）见郑珍才学超群，对他很器重，向他指出：“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并令其服膺汉学大师许（慎）、郑（玄）之学。郑珍遵循恩师的指点，由文字训诂入手，而后研治经义。后来在经学、文字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西南硕儒。

道光六年（1826），郑珍首次进京应试不中，时程恩泽调任湖南学政，招他入幕。程恩泽与祁寯藻共同倡导宋诗运动，主张学苏、黄而规杜、韩，以扭转当时摹拟盛唐时的柔靡诗风。宋诗派的特点是：主张经术、学问和诗艺结合，以学问入诗，其诗风奇崛奥衍。程的诗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郑珍的影响极深。郑珍在湘期间，还结识了著名诗人欧阳绍谔（字涧东）、邓显鹤（人称湘皋先生），互相切磋诗艺，受益匪浅。在良师益友的指导下，郑珍的诗歌创作日益精进，其成就不仅为宋诗派诸人之冠，而且还与龚自珍、黄遵宪齐名诗坛，为晚清著名的三大诗人。

道光八年（1828），郑珍为应乡试返黔。先后三次乡试落选，便在家刻苦研究汉学。道光十四年（1834）冬，郑珍带着自己的《说文新附考》进京，请教程恩泽（时任礼部侍郎）。程看后评价很高，认为郑珍的学术水平已超过了钮玉树的《说文新附考》。郑珍在汉学、诗歌等方面都深受程恩泽的濡染。他在诗中回忆道：“我为许君学，实自程夫子。忆食石鱼山，笑余不识字。从此问铉错，稍稍究《滂喜》。相见越七年，刮目视大弟。为点《新附考》，诂过匡石氏。公时教惠、王，归沐辄奉几。每叹伯申丧，无一可共语。留我卒汉业，令馆王学士。区区苦思归，告别前街

邸。月中行且育，送我至驛市。焉知即永诀，师弟终一世。”

道光十七年（1837），郑珍32岁中举人。是年冬第二次进京，次年春闹落第。道光二十三年（1843），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仍不第归。这两次参加会试，都因临考前患重病，勉强应试，科场受挫，故而叹曰：“我生少媚骨，所遇辄坎坷。”郑珍因参加过三次会试，被拣选为“大挑”二等，以教职铨补，回省候缺。先后任古州、镇远训导，荔波教谕，均未逾年即归。晚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地方动乱，贫病交迫，迁徙无定，后迁居禹门岩中，不久患喉疾，卒于清同治三年（1864），享年59岁，惜乎早逝。

二

郑珍的一生，勤奋奋进，艰苦卓绝，学术精深，著述丰富。著有《仪礼私笺》8卷、《经说》1卷、《考工轮輿私笺》2卷、《说文新附考》6卷、《说文逸字》2卷附录1卷、《汗简笺证》8卷、《郑学录》2卷、《龟氏图说》1卷、《巢经巢经说》1卷、《亲属记》2卷、《巢经巢文集》5卷、《巢经巢诗集》9卷、《遵义府志》48卷（与莫友芝共修）、《荔波县志》、《播雅》24卷、《母教录》1卷、《樗菴谱》1卷等。莫友芝《巢经巢诗抄序》评价道：“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章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莫友芝的这一看法果然言中，郑珍的《巢经巢诗集》自刻板印刷以来，多家翻印，广为流传，而郑珍在诗坛的名声也大作。

郑珍是清宋诗派后起之秀，诗歌造诣很高，历来得诗论家

好评。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评介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润东绍铭、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子尹先生，以道光乙酉拔贡，及程春海侍郎之门，故其为诗濡染于侍郎者甚深。侍郎私淑昌黎、双井，在有清诗人，几欲方驾蒋石斋（指钱载）。天不假年，而子尹与道州从而光大之，寿阳又相先后其间，为道咸以来诗家一变局。窃谓子尹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摹仿杜韩，则多读书故也。”宋诗派中多是学者兼诗人，郑珍不仅学问精深，其诗歌成就为宋诗派诸人之冠。汪辟疆在《近代诗人述评》中认为：“郑氏集经巢诗，理厚思沉，工于变化，几驾程（春海）、祁（藻）而上，故同光诗人之宗宋人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也认为“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为尊《集经巢诗》为宗祖。”对郑珍从程春海侍郎学宋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评价很高。

郑珍善于学习和吸取历代诗家之长，熔铸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郑知同《行述》中说，郑珍“早年胎息眉山，终模韩以规杜”。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称郑珍“诗学苏轼，兼尊韩、孟（郊）”。陈柱《答吕生芳子论诗书》中说：“惠书评论金亚匏、江弢叔、郑子尹诗，良足启予。子尹经术学问实出二家之上，其深厚渊奇，冶韩杜于一炉，而自成巢经巢之诗。”钱仲联《论清诗四十家》中指出：“子尹诗盖推源于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程千帆《清诗管见》中说：“郑子尹学韩（愈），却以朴实救韩的险怪。”钱钟书《谈艺录·学人之诗》中评道：“清人号能学昌黎者，

前则钱蔣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蔣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摺奥衍开生面。程、郑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陈田《黔诗纪略后编》中说：“诗则早岁措意眉山，晚乃由韩孟以规少陵，才力横恣，范已规度，冥心妙契，直合古人。又通古今训诂，奇字异文，一入于诗，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称赞郑诗古朴奇秀之美。胡先骕称巢经巢诗“以苏、黄、杜、韩之风骨，而饰以元、白之面目”，并认为：“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对郑珍评价最高。钱仲联也称赞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论近代诗四十家》）

陈声聪在《兼于阁诗话》附录《巢经巢》一文中，对郑诗作了全面的评价：“清道、咸间，郑子尹（珍），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越前代。公以一举人入京会试不售，终老乡里。论其地，遵义为西南僻壤；论其身世，一广文耳。而其《巢经巢诗》乃精深沉博、瑰诡奇肆如是，盖学足以善其才，才足以运其学，故华实并敷，意境特奇，所言‘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者，实具有创造性。其诗固甚奥衍，多在文从字顺处。”此文还摘引了郑珍的《武陵烧书院》、《抄东野诗毕后》等十多首诗，进而指出：“常情至理，琐事俗态，人不能言，而彼独能言之，读之使人嗔喜交作，富有生活气息。公晚遇贵州苗民之变，对于官府及社会现实亦多所反映，思力手段，为近百年人所共推。”

在清末和民国年间，郑珍《巢经巢诗》备受推崇，称郑氏为清道咸间一大诗宗，《巢经巢诗》被视为“枕中鸿宝”（陈夔龙《郑珍君遗著序》）。著名文学家吴敏树认为“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见赵恺《巢经巢遗诗跋》）。现当代旧体诗作家大都喜读巢经巢诗，著名诗人郁达夫对郑珍尤为尊崇，他写的旧体诗或“语言率直”，或“诗句僻涩”，颇有宋诗风味。他在使词、排韵、炼字方面均受郑诗濡染。总之，郑珍和龚自珍、黄遵宪以及清初的顾炎武、吴伟业，康乾间的王士禛、袁枚、黎简、张问陶等人，都配称“三百年第一流”的诗人（柳亚子《论诗三绝句》）。

关于郑诗的艺术风格历来有多家评论，如莫友芝的“雋伟宏肆”、陈夔龙的“奥衍渊懿”、陈衍的“生涩奥衍”、陈柱的“深厚渊奇”、翁同书的“简穆深厚”、刘大杰的“横恣俊峭”等说。纵观郑诗既有“生涩奥衍”，也有“平易自然”；既有“雋伟宏肆”，也有“艳逸清丽”，还有“酸涩醇厚”等特色，而又以“奇奥”和“平易”两种风格为主。郑诗风格的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受程春海侍郎的影响，为诗攀奇逐奥，显得“生涩奥衍”。中年科场累遭挫折，穷居山乡，生活境况与孟郊相似，诗风也相近，酸涩醇厚。狄葆贤《平等阁诗话》中说：“为诗不主放常而自然幽峭，论者谓东野之嗣音。”姚永概《书郑子尹诗后》云：“生平怕读郑莫诗，字字酸入心肝脾。”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席卷半个中国，清王朝开始走向崩溃。郑珍生活在这江河日下，时局动荡的时代，目睹朝廷腐败，官吏横行，民生凋蔽，与杜甫晚年处

境相似，诗风也相同，郑珍晚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如《经死哀》、《抽厘哀》、《僧尼哀》，《禹门哀》、《南乡哀》、《绅刑哀》、《哀里》、《哀陴》、《吴军行》、《捕豺行》、《东家媪》、《西家儿》、《饿四首》、《杀二首》、《疫》以及长诗《避乱纪事》、《闰八纪事》等等。这些诗篇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战乱灾害的凄惨情景，深刻地揭露了官吏敲榨百姓，草菅人命，贪婪残暴以及兵勇、盗贼如豺狼般凶狠的罪恶行径。陈衍《秋螭吟馆诗抄跋》中评价说：“子尹盖颇经丧乱，其托意命辞，又令少陵、次山、昌黎熔铸而变化之，故不同寻常之诗也。”而从这些诗篇所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强烈的思想性来看，均不亚于杜甫的《三吏》、《三别》。黎汝谦《巢经巢诗后集引》指出：“然吾观先生晚岁之诗，质而不理，淡而弥真，有老杜晚年境界。”

但因郑珍是经学大师，故常以正统的儒家思想观点去观察现实，判断是非，则难免有失误之处。反映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诗中，把太平军和义军视为“贼”，并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些封建糟粕应当批判，但这是受时代、阶级和儒家思想的局限，对作者不应苛求。

三

遵义杨元桢先生的遗著《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是他用毕生精力进行注释的成果。《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分为前后两集，前集依据咸丰二年（1852）望山堂刻本《巢经巢诗抄》九卷，这是最早刻印的郑珍诗集。编入道光六年（1826）至咸丰元年（1851）这25年中，即郑珍22岁至47岁时写的诗共490首。这个版

本系作者自己编的，完全按年代先后编排，由其子郑知同写字付刻，是前集最好的刻本，也是前集诗其他刻本的祖本。最早的后集本是光绪二十年（1894）高培谷刻的《巢经巢诗抄后集》四卷，这个刻本收诗262首。其次是光绪三十年（1904）唐炯所刻《巢经巢遗稿》四卷，这个刻本收诗299首。这两个刻本都不完整，各刻了一大半，又未注明年代。遵义赵恺编《巢经巢诗抄后集》时，将这两个刻本所收的诗合在一起，并经过一番考订，“删其重复，厘其先后”，按照年代先后编排，使其和前集诗体例一致。赵除收入已有刻本的郑诗外，还收入了十几首新发现的手稿，如《自讼》五言诗一首，系根据新得墨稿，编入后集卷五。又如《积雨中送季和往通城兼寄柏容》系根据黎氏藏稿，编入后集卷三。余不再列举。赵恺编的《巢经巢诗抄后集》六卷，收入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三年（1864），这十三年间郑珍写的诗³84首。杨元桢注释的《郑珍巢经巢诗集》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此外还收入集外诗18首。经与赵恺编的《巢经巢诗抄后集》对勘，多出6首，如：《题画》一首，为郑珍给《红桥画图》题诗，杨注本依据墨迹收录，赵编集外诗未收；《闰八纪事百韵》，赵编后集卷五收入为《闰八纪事》，杨元桢认为手迹与刻本不同，原因是经郑珍删易，为保留不同内容，又作为集外诗收入；《酬赵晓峰》四首，这四首诗为赵恺所删。这次编者又收入《斤溪老翁歌》一首，编入集外诗中。此诗原载陈夔龙花近楼刻《郑征君遗著·巢经巢遗诗》中。赵恺编《巢经巢诗抄后集》时，以“气体不类”为由，将此诗剔除。《巢经巢诗集校注》共收入郑诗893首，另附词9首。这是现今搜集郑珍诗最完备的版本。

作诗不易，注释尤难。因为诗人常常见景生情，兴到笔随，

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学，不受约束。而注释者则“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因此注诗难，而注释郑子尹的诗则更难。因为郑是经学大师，博通经史，是学者兼诗人。他的诗不仅典故多，文词奇奥，而且文思奇兀，意旨很深。正如陈衍在《近代诗抄序》中指出，郑诗具有“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特色。杨元桢注释郑子尹的《巢经巢诗集》，广收深考，花了很大功夫。校注本旁征博引，采集了《十三经》、“二十四史”……书篇篇目多达386种之多，全书注释了2000余条。引用这么多古籍书注明郑诗中用典的出处，这对研究《巢经巢诗》很有参考价值。校注本还对郑诗中的乡邦僻事，身家细故，作了注释。这不但没有类书可抄，甚至是“地方志乘不备录，私家文字不及载”，全靠实地考察，深入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于读郑诗的人来说：“不知本事，无以读其诗，不详典语，无以究其意。”杨元桢对郑珍的890余首诗几乎全部作了校注，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确实难能可贵。

从杨元桢所注释的郑珍《巢经巢诗集》来看，还很不完善。首先是杨的注释方法较为陈旧，基本上属于照抄类书。虽注明了本事和诗中用典的出处，但还缺乏言简意赅地道出用典的深刻寓意和画龙点睛指出诗的绝妙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所注释的内容还有欠缺，详略未免失当，有许多批注尚待修改。这些不足之处，杨元桢先生尚未来得及补充修改，便与世长辞了。杨元桢先生耗一生心力，辑成书稿《巢经巢诗集校注》，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五十余年来，鲜为人知，几被埋没。一九八二年，陈福桐同志受其亲属之托，向我推荐杨元桢先生的这部书稿。之后，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列入了出版计划，